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della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

利玛窦 著

Matteo Ricci S.J.

文铮译 梅欧金校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

〔意〕利玛窦 著

文 铮 译

〔意〕梅欧金 校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意)利玛窦著;文铮译;
(意)梅欧金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08452-9

I. ①耶… II. ①利…②文…③梅… III. ①基督教史—
中国—明代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438号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

[意]利玛窦 著

文 铮 译

[意]梅欧金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452-9

2014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4 1/4

定价:100.00元

782880210

Matteo Ricci S. J. , edited by Pasquale D'Elia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della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 1949

本书据罗马-意大利国家书店《利玛窦史料》1942—1949年版译出

本书翻译出版得到美国旧金山大学
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资助



译者前言

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是译者根据罗马-意大利国家书店(La Libreria dello Stato)于1942年和1949年出版的三册《利玛窦史料》(Fonti Ricciane)译出的^①。该史料前两册的主要内容是由利玛窦手稿直接整理而成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以下简称《传教史》),第三册是这套资料的编者和注释者德礼贤(Pasquale D'Elia)编制的索引与附录等内容,因其不属于利玛窦本人著作,故未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参考了意大利Quodlibet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同名著作。

利玛窦(Matteo Ricci)是西学东渐的开创者,西方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而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则是他用母语撰写的最为重要的汉学著作。因此,早在1983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完整中文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依据的母本是1953年出版的英译本。1986年中国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了从意大利原文翻译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1998年,在译者动笔翻译本书时,曾有一些海内外学者对这次翻译、出版工作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上述两个中译本已经存在多年,并一版再版,中国绝大多数读者阅读和使用的都是这两个文本。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复译呢?这个译本与以前的译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它对研究利玛窦及其相关领域有什么价值?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先了解一下原著的写作经过和坎坷遭遇。

早在1594年,当利玛窦还在韶州传教的时候,就萌生了将耶稣会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的念头,这一年的10月12日利玛窦在给同为耶稣会士的同乡吉洛拉莫·科斯塔(Girolamo Costa)的信中提道:“如果把我们传教事业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向您详细介绍,那么我应该写一部历史书,而不只是写信,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对这段历史做一归纳

和回顾。”^②然而,这一等就是14年,直到1608年,利玛窦才真正开始将他的这个愿望变成现实。1609年2月17日,利玛窦在给他的上级——耶稣会总会长助理阿尔瓦莱兹(João Alvarez)的信中写道:“去年年底,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想到,在最初进入中国的人中,只剩下我一人,现在已无别人知道这里传教事业最初的情况了,因此最好把这些事情按照它们发生的顺序加以整理,尤其是把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写下来,因为别人的报告与真实情况有很大出入。我已开始草拟一份报告,我想您那里会对我们这里的事有很大兴趣。如果在去印度的船出发之前我能完成这份报告的一部分,我会马上将它寄往罗马,您就会在那里看到它了。但我怕工作太多,不允许我做这件事。”^③事实的确如利玛窦信中所说,北京繁忙的教务和日常工作使他未能赶在1608年邮船起锚之前(一般为每年9月)将这部五卷本《传教史》的部分内容寄往罗马。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玛窦在1608年初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根据他收集的资料开始写作了。

至于利玛窦结束写作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原著中找到线索:在第五卷第16章,也就是利玛窦生前亲笔完成的倒数第二章中,详细记述了1609年圣诞节当天,南昌教堂整饬一新,对教友重新开放的情景。当时利玛窦本人寓居北京,欲收到南昌关于此事的信件最快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利玛窦完成第五卷第16和17两章的时间是在1610年2月到5月初之间,因为5月3日利玛窦就一病不起了,直至八天后去世。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辞世。临终前他把这部回忆录的手稿交给了他的继任者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并“在临终时再三强调,在呈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之前不要给任何人看。”^④利玛窦去世前后,他的传教策略,尤其是对待中国礼仪问题的态度受到了耶稣会内部和罗马教廷中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是反对,即使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的意大利同胞龙华民——也在礼仪问题上与他持不同观点。1612年8月,龙华民派金尼阁以中国传教使团代理人的身份前往罗马,向教宗保禄五世汇报教务工作。此次金尼阁身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汇报并解决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金尼阁启程前,龙华民将利玛窦回忆录的手稿交给了他,委托他带往罗马,转呈耶稣会总会长。金尼阁随身携带这部手稿辗转澳门、印度果阿,再于1613年2月9日从那里登船出发前往欧洲。

在漫长的旅程中,金尼阁开始将这部用意大利文写成的手稿译为拉丁文,因为罗马天主教传统上一一直用拉丁语作为教会的正式语言和礼拜仪式的专用语言。1614年秋,金尼阁抵达罗马,在各项公务之余,每晚都要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翻译利玛窦手稿,并最终将其完成。然而,金尼阁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手稿的文字内容逐字逐句地移译,而是对其内容进行了部分的修改、增补和编辑。次年秋天,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在奥格斯堡(现为德国城市)出版,这个版本有一个很长的拉丁文书名:《耶稣会进行基督教在中国的远征/自同会利玛窦神父的五卷本回忆录/致教宗保禄五世/中国的风俗、礼法、制度和新开端/最准确、最忠实地描述传教事业极为艰难的初始阶段》(*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 Ex P. Matthaei Ricij eiusdem Societatis Commentarijs. Libri V. Ad S. D. N. Paulum V. In quibus Sinensis Regni mores leges atque instituta & nova illius. Ecclesiae difficillima primordia accurate et summa fide describuntur.*)。此书的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初版后的六七十年间,这部书先后再版了四次(1616年、1617年、1623年、1684年),同时还被转译成法文(1616年出版,1617年、1618年再版)、德文(1617年出版)、西班牙文(1621年出版)和英文(选译本,1625年出版),甚至连1622年的意大利文版也是转译自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版本都把金尼阁的名字作为作者,而非译者身份出现在书上,而且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或者是出于别的什么复杂原因,金尼阁对利玛窦手稿的下落只字不提,任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但当他谈到自己与这部著作的关系时,也曾这样说道:“我被指派承担这个任务,主要想到的是阅读利玛窦神父记事的手稿并将其译成拉丁文……还有必要补充其尚未完成的部分,并且增加某些条目和充实一些内容,那是我们善良的神父出于谦虚曾经完全省略或信笔带过的地方。”^⑤但是,由于金尼阁译本的广泛影响,后世的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这部书是利玛窦和金尼阁二人合著的。自金尼阁拉丁文版诞生以后,利玛窦的手稿就不知去向,一直销声匿迹了将近三百年之久。

那么,利玛窦《传教史》手稿究竟在何处?这个谜直到1909年夏天才被意大利耶稣会士文图里(Pietro Tacchi Venturi)破解——一个偶然的机,他在耶稣会档案馆的故纸堆里发现了那部鲜有人知或根本就早已被人遗忘

的利玛窦《传教史》手稿。文图里如获至宝,很快将这部手稿整理出版,并添加了必要的注释,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以下简称《历史著作集》),全书共两卷,第一卷于1911年出版,名为《中国回忆录》(*I commentarj della Cina*),第二卷于1913年出版,名为《中国来信》(*Le lettere dalla Cina*),收录了利玛窦在印度和中国所写的书信和教务报告。利玛窦《历史著作集》的出版在欧洲再次引起轰动,使“消失”了几个世纪的利氏手稿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拉近了今世读者与一个完全真实的利玛窦的距离。人们得以见到这部重要著作的庐山真面,应该感谢文图里,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在他看来,《历史著作集》还存在不少缺憾,例如,书中出现的中国专有名词尚未标注汉字,书中涉及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容尚需专业性更强的考据和注释等。因此文图里非常希望出版一部有详细注释、考据和索引的利氏手稿全集。

文图里版的《历史著作集》印刷数量有限,初版二十余年后,在欧洲已经很难寻到。1934年,文图里终于获得了耶稣会会长的批准,把当时正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德礼贤神父调回罗马,专门筹备新版利氏手稿的编辑出版工作。熟悉当代西方汉学史的人都知道,德礼贤的汉学功力深厚,长于考据,被誉为“意大利最后一位传教士汉学家”,也是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西方汉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编注《传教史》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中国典籍和古今著作以及在欧洲保存的历史文献。同时,他还直接得到了向达、袁同礼等中国学者的学术支持^⑥。德礼贤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历时数载,终于在1942和1949年完成了三册《传教史》的出版工作。

起初,文图里和德礼贤商定,准备整理出版六册《利玛窦史料》,前三册为《传教史》,后三册为《利玛窦书信集》,但最终他们未能如愿,只有前三册问世。德礼贤将这三册书命名为《利玛窦史料——天主教传入中国史》(*Fonti Ricciane-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在这里他既没有采纳文图里版《中国回忆录》的书名,也没有沿用利玛窦手稿中《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的原名。但是,我们这个中文译本仍然采用利玛窦手稿上的原名。

将利玛窦手稿、金尼阁版本和德礼贤《传教史》三者进行比较,我们会发

现金尼阁对利玛窦手稿的增补、修改和编辑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 将利玛窦生前已准备好资料，但未及落笔的内容补充完整。金尼阁将这些资料誊抄在利玛窦手稿中空出的白纸上，其具体情况如下：

(1) 第四卷的第 17 章后半部分和第 18 章^⑦；

(2) 第五卷的第 18 至第 20 章。

上述这些资料都是用葡萄牙文撰写的，很可能就是各地寓所的年度报告以及龙华民寄给利玛窦的一般性教务报告。金尼阁在誊抄时可能做过一些编辑整理的工作，但现在那些报告的原始资料已遗失，无从考证。

2. 添加了介绍从利玛窦病倒直至安葬情况的章节：

第五卷第 21、22 两章。

这两章本没有题目和序号，是加在利玛窦手稿的最后两页半白纸上的，用拉丁文写成，但其笔迹是不是出自金尼阁之手还未成定论^⑧。意大利耶稣会士、历史学家巴尔托利(Danillo Bartoli)认为这两章中记述的内容主要是熊三拔(Sabbatini de Urisis)神父提供的，因为他可能对利玛窦临终及死后的情况最为了解。而德礼贤认为，这些内容大概是金尼阁抵达罗马以后(1614 年年底至 1615 年年初)添上去的，第 21 章所用的参考资料是费奇观(Gaspar Ferreira)神父 1610 年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于 1613 年由金尼阁译成拉丁文后一并带回罗马^⑨；而第 22 章资料的主要来源可能是金尼阁自己于 1612 年在南京所写的 1611 年年度报告，而这份报告又是在当时中国传教团负责人龙华民的授意下撰写的。德礼贤将以上两部分内容收入了《传教史》，并在注释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3. 对手稿部分内容进行了改编，并就一些敏感问题阐发了个人观点。

众所周知，利玛窦死后，他的传教策略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这些争论后来升级为教会内部旷日持久的争端。从金尼阁拉丁文译本来看，他基本上是尊重并积极维护利玛窦形象的。但是，他毕竟不甘于做一个单纯的翻译者，作为在华传教士和负责向教宗当面汇报中国教务的使者，在翻译过程中他也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阐释，例如，他在拉丁文译本第二卷中添加了一整章(第一章)内容，讲述了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Javier)试图进入中国传教未果而亡的经过；再如，他把利玛窦手稿第一卷第 10 章关于中国宗教派别的内容拆分为两章，将儒、释、道单列一章，又把手稿其他章节的

一些相关内容挪过来并加以串联和敷衍,形成新的一章,讲中国的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状况。金尼阁的这些个人创作体现在了拉丁译文中,这就是为什么德礼贤说这个拉丁译本“时而确切,时而并不确切”的原因^⑧。当然,德礼贤未将这些内容纳入他的《传教史》。

金尼阁的拉丁译本在西方学界毁誉参半,有些人认为译文的笔调和风格与利玛窦的格格不入,有人认为这个译本系统地歪曲了利玛窦的思想。当然也有人认为尽管金尼阁对原稿进行了修改,但仍值得关注。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学上的成功应主要归功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因为利玛窦曾一再声明自己的意大利语水平下降,影响了写作。

大致了解了这部书的写作、翻译和出版经过,以及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再让我们看看目前已有的两个中译版本的情况。

中华书局版的书名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于1983年,是“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的一本,200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此书。这个版本由何高济、王遵仲、李申三位先生合译,审校者是著名的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该译本的母本是1953年美国纽约Random House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译本,原书名为*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是译者Louis Joseph Gallagher根据金尼阁1615年的拉丁文译本转译成英文的。

2002年夏,译者在初步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后,有幸见到了中文版译者之一何高济先生。何先生欣然阅读了部分译稿,肯定了我们的翻译工作,并就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意见,还对当初没来得及按照何兆武先生的意愿,以意大利文原著对其译稿从头到尾校订一遍而感到遗憾。近30年来,《利玛窦中国札记》已成为中国大陆读者了解利玛窦和进行相关研究的主要参考文本。但近年来,出于前文提到的原因,很多大陆学者为了阅读和引用更加接近于利玛窦手稿的文本,或为了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利玛窦,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台湾光启社版的译本。

台湾光启社版译本出版于1986年,所依据的母本也是罗马-意大利国家书店1942—1949年版的《利玛窦史料》,与我们这个译本用的是同一个母本,译者是刘俊余、王玉川和罗鱼先生。这个译本首次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

原著译成中文,因此得到了很多专业研究者的青睐,因为这个译本比中华书局译本更接近于利氏手稿。然而,一些专家学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译本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例如误译、误排和装订错误等”,提出“需要纠正,甚至重译”^①。本人也曾对照意大利语原文通读过台湾光启社的译本,发现了不少语言理解上的问题,错译和漏译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出版一个更加忠实于利玛窦手稿的中文译本,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前任所长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神父于1998年初带病来到北京,为《传教史》的翻译工作物色人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庸先生的推荐下,译者接受了马爱德神父的“考核”,并最终承担了翻译任务。但遗憾的是,此次晤面后不久,神父就因劳累过度病逝于香港,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继马爱德神父之后,吴小新先生接手此事,正是在吴先生的鼓励、督促和积极协调下,译稿才最终完成并得以出版。

在翻译过程中,德礼贤为《利玛窦史料》做的大量注释给译者的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尤其是在中国人名、地名、著作名、官职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上,译者基本沿用了德礼贤所注释的中文,而译者本人的注释也每每引用德礼贤的观点。此外,译者还翻译了德礼贤为每章内容编制的提要,置于各章正文前面,以方便阅读。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德礼贤对利玛窦手稿的注释极为详尽,考据严谨且不厌其烦,所以说德礼贤注释本身就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汉学著作,只可惜因本书体例和篇幅所限,不能将这部分内容完全呈现给读者,实为憾事。

由于这部著作的重要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译者总是小心翼翼,对原文“亦步亦趋”,生怕错会作者本意。在翻译语言上,译者力求平实顺畅,反映原文风貌。但是,利玛窦在华生活了28年,平时用母语意大利语的机会远远不如用葡萄牙语和汉语那样多,从而导致他在用母语写作时会偶尔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当原文中出现语法或表达混乱时,译者会努力体会作者意图,尽量使译文连贯通顺。对于原文内容上的疏漏和错讹,译者会原原本本地译出,未敢擅自改动。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在初译稿完成后,吴小新先生聘请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意大利籍中国历史学博士梅欧金(Eugenio Menegon)先生专程来华,与译者一同工作,以对照意大利语原文、逐字逐句诵读译文从而进行校雠的方式来修改译稿,译文和译者注释中出现的外文也蒙

梅欧金先生认真核对过数遍。此后,文庸先生不辞辛苦,先后校读译稿三遍,并在历史和宗教方面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曾为中华书局《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谢方先生也拨冗通读了本书译稿,严肃指出了译者的粗疏之处,并亲自为译文添加了不少注释。另外,在吴小新和梅欧金二位先生的建议下,我们还为此书编制了人名、地名和著作名的索引,置于书后,以方便读者查阅。从本书开始翻译到最终付梓的这十余年间,何高济、吕同六、卓新平、张西平、金国平、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萨巴蒂尼(Mario Sabbatini)、米尼尼(Filippo Mignini)等前辈学者也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对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常绍民、丁波先生以及本书的编辑肖尧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出的贡献。

现在,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在经过十余年的翻译、审校、修改和等待后,终于能够出版了!此时此刻,译者在欣幸之余也有一丝不安,担心译文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译文中的任何错误和纰漏都是由于译者的浅薄和疏忽造成的,本人要为此而承担责任,只是衷心希望发现这些问题的读者能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反馈给本人,以便及时订正,从而不断完善这个译本。

文 铮

2013年5月27日于罗马大学

译者注:

① *Matteo Ricci,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德礼贤编, 罗马: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年版。

② *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Francesco D'Arelli 编, 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 Quodlibet 2001年版, p. 188。

③ *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Francesco D'Arelli 编, 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 Quodlibet 2001年版, p. 521。

④ *Matteo Ricci,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第二卷, *Le Lettere dalla Cina*, 1612 年 11 月 21 日龙华民致阿夸维瓦信, P. Tacchi Venturi 编, 意大利马切拉塔: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1913 年版, p. 488—492。

⑤ *Matteo Ricci, Fonti Ricciane*, 第一册, 引言, 罗马: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年版, p. CLXXIV。

⑥ *Matteo Ricci, Fonti Ricciane*, 第一册, 德礼贤前言, 罗马: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年版, p. XXII。

⑦ *Matteo Ricci, Fonti Ricciane*, 第二册, 第四卷, 第十七章, 德礼贤按, 罗马: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年版, p. 196。

⑧ *Matteo Ricci, Fonti Ricciane*, 第二册, 第五卷, 第二十一章, 德礼贤按, 罗马: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年版, p. 530。

⑨ 同上。

⑩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 附录: 1978 年法文版序言,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p. 460。

⑪ 谭世宝:“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译本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4 期。

目 录

第一卷 绪论:中国和中国人

第一章	撰写这部史书的原因及写作方法	3
第二章	关于中国的名称、面积和位置	5
第三章	中国大地的物产	9
第四章	中国的制造工艺	15
第五章	关于中国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中国的学位	20
第六章	中国的政府机构	30
第七章	中国的礼法	42
第八章	关于中国人的相貌、穿着打扮及其他风俗	54
第九章	中国的迷信与其他陋习	58
第十章	中国的宗教派别	67

第二卷 肇庆的寓所

[1583年9月、10月—1589年8月上旬]

第一章	我们当初如何决定进入中国 [1552—1582]	81
第二章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神父们三次进入中国,但都未能立足 [1582年3月9日—1583年8月10日(约)]	87
第三章	神父们是如何被召到肇庆,最终获得许可证和一块供修建寓所的 土地而在中国定居的 [1583年8月15日(约)—1583年9月底]	94
第四章	神父们逐渐开始与中国人谈论天主教 [1583年10月—1584年11月25—29日(约)]	101
第五章	罗明坚神父去澳门,利玛窦神父肇庆遇险;把铁钟和译成中文的 地图作为礼物送给知府 [1583年12月—1584年10月]	105

第六章	神父们获得许可让西班牙国王的使节来中国;卡普拉莱神父抵达肇庆 [1584年5月2日—11月26日(约)]	111
第七章	为促进传教事业,又有两位神父从印度来华:一位是孟三德神父 ——中国传教事务的负责人——他获得许可来到肇庆;另一位是 麦安东神父,后来与罗明坚神父前往浙江省 [1585年4月1日—1586年4月]	115
第八章	罗、麦二神父返回肇庆;罗神父又赴广西;此间发生的其他事情 [1586年7月—1587年7月]	119
第九章	岭西道害怕神父们留在肇庆,于是编造理由,迫使孟三德神父返回 澳门;这一事件后神父们又遇到一个大麻烦 [1587年7月27日—12月]	122
第十章	罗明坚神父回到澳门并留在那里;孟三德神父来肇庆,当地百姓又 给寓所带来麻烦 [1588年1月—7月]	127
第十一章	范礼安神父派罗明坚神父去罗马,请求教宗派神父们作为他的 使节去觐见中国皇帝;范神父派麦安东神父来肇庆;肇庆又起风波 [1588年8月—12月]	130
第十二章	神父们在肇庆寓所取得的成果 [1583年9月、10月—1589年8月上旬]	135
第十三章	神父们在肇庆寓所中经受到的最后挫折;都堂刘节斋把神父们 逐出肇庆 [1589年4月—8月初]	139

第三卷

第一部分 (第一章至第九章) 韶州的寓所

[1589年8月26日—1595年4月18日]

第二部分 (第十章至第十四章) 南昌的寓所

[1595年6月28日—1598年6月25日]

第一章	如何建立韶州的寓所;中国的传教事业又一次从头开始 [1598年8月1日—10月1日]	149
-----	---	-----

第二章	神父们被重新召回肇庆的消息是如何传到澳门的；人们皆大欢喜； 视察员范礼安神父为协助中国的神父们，派来两名准备入会的 中国青年，并全力支持传教团各方面的工作 [1589年9月—1590年6月20日(约)]	157
第三章	瞿太素到韶州定居，成为利玛窦神父的弟子，之后又随利神父去了英德 [1590年底—1591年9月]	160
第四章	神父们在韶州经历的一次考验，孟三德神父来到韶州；孟三德神父 在返回澳门的途中被扣留 [1590年底—1591年9月]	165
第五章	麦安东神父之死，石方西神父到达韶州 [1591年10月11日—12月底]	169
第六章	利神父是如何去南雄，又在那里使一些人信教的 [1591年底—1592年6月(约)]	173
第七章	一夜，神父们被入户的盗贼袭击，盗贼们持凶器打伤两位神父后 被官方缉拿归案，但又经神父说情被释放 [1592年7月—1594年6月]	177
第八章	石方西神父之死，郭居静神父来韶州接替他 [1593年11月5日—1594年11月]	182
第九章	利玛窦神父第一次去南京及旅途中的遭遇 [1594年11月(?)—1595年5月31日]	185
第十章	利玛窦神父是如何被逐出南京而又返回江西南昌的 [1595年6月1日—29日]	194
第十一章	如何在南昌建立寓所 [1595年7月—9月]	199
第十二章	利玛窦神父如何与两位王爷成为朋友；利神父与南昌文人的交游 [1595年8月20日(约)—10月]	204
第十三章	利玛窦神父将在南昌取得的成绩报告给澳门方面，孟三德神父派苏 如望神父到南昌，神父们在南昌置办房产 [1595年12月—1596年7月]	207
第十四章	郭居静神父在韶州遇到的麻烦，龙华民神父和罗如望神父来到韶州 [1596年9月—1597年12月底]	211